

文艺风云书系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徐庆全 著

# 风雨送春归

——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

文艺风云书系

徐庆全 著

# 风雨送春归

——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送春归: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/徐庆全  
著. —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5.11  
(文艺风云书系)  
ISBN 7-81091-418-9

I. 风… II. 徐… III. 当代文学—文学史—研究—中国 IV. I20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3439 号

---

出版人 王刘纯  
责任编辑 张玉梅  
责任校对 张弛  
责任印制 王慧  
装帧设计 张胜

---

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 
地址: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:475001  
电话:0378-2864669(行管部) 0378-2825001(营销部)  
网址:www.hupress.com E-mail:bangong@hupress.com

经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 
排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 
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
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 650mm×960mm 1/16 印张 27.75  
字数 399 千字  
印数 1-3000 册

---

ISBN 7-81091-418-9/I·251
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## 自序

这本书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《文坛拨乱反正实录》的副产品。在撰写《文坛拨乱反正实录》一书时，我将数年来所搜集的材料和采访记录一一摆上案头，拉开架式，准备将新时期文坛所发生的大小事情，一一勾勒出来。可是，这样的架式端了没多久，我发现，这与出版社的要求相差甚远。所谓“文坛拨乱反正”，只能是几条大的线索铺排出来的场景，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。单纯地勾勒每一件事情，且不说出版社所要求的篇幅容纳不下，就是能这样写，也需要几年的功夫。所以，只好改弦易辙，乖乖地放下架式，按出版社的要求来写。

不过，即使勾勒大的线索，也需要对那早春文坛所发生的事情钩沉。因此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大致还是将几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。

第一件是，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——套用那时的语言，彻底推翻经毛泽东审定的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所提出的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。要推翻这个观点，必须追根溯源，从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说起。而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，尤其是其间所发生的“国防文学”和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的口号的争论，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。因此，在文艺界人士同仇敌忾地声讨“四人帮”在这个问题所制造的混乱的同时，以往的人事关系又冒出来了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：拨乱反

正的工作继续进行，而人事恩怨继续纷纷扬扬。主线和枝蔓相互交错，使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戏剧性。

第二件是，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。文坛老前辈都记得，这次大会筹备的过程很艰难，会期一拖再拖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周扬代表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，由于意见分歧，不能按时成稿。之所以会有分歧，是因为当时文艺界、甚至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，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、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的三年文艺界形势的看法不一致。有分歧，就有争论。涉及到文代会的主题报告，不但主持起草的班子更换，而且报告八易其稿——我所收藏的有关这一报告起草过程中所留下的档案，就能装一个柜子。

第三件是，关于电影剧本《苦恋》（后拍成电影《太阳和人》）的争论。这一争论，由两军对垒、剑拔弩张，到统一思想、一面倒，再到后来余音袅袅，持续将近三年。一部作品引起这样的客观效果，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，但在当年，上至中央最高领导，下至一般的作家，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。在尘埃落定之后回头看，这部作品也就是个引线，它所引爆的“火药库”，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，是对“文革”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政治意识形态看法分歧的淤积，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，则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。只不过起草文代会报告时没有引线，到现在才有了引线而已。

我当时的想法是，要把这三件大事完完整整地——当然是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——写进《文坛拨乱反正实录》一书中。当然，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，主要原因还是书的篇幅问题。因为篇幅有限，我也就偷懒了，对这三件大事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。其中，关于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“两个口号”的争论问题和《苦恋》各写了有四万字，周扬主题报告起草过程则基本上是一笔带过。就是这样，最后成书时，限于篇幅，《苦恋》这一部分还是拿掉了。

《文坛拨乱反正实录》交付出版社后，我即开始对这三件大事作完整的梳理。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稿子是逐步完善的——当然是在我看来。关于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

的评价这一部分,修改完成后交付《鲁迅研究月刊》,以《关于“两个口号”论争的评价》为题,在该刊连载三期。《周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》一文,原文六万多字,交付《新文学史料》发表时,考虑到篇幅,我做了删节,最终在该刊发出来的有五万字左右。《苦恋》一稿,原文也有六万多字,交付《温故》发表时,冯克力兄要求压缩到五万字以内,分两期来发表,也只能按其要求作删节。

当然,稿子交付给编辑,并不意味着补充、修改的停止。此后,我又陆续地作了些补充,最终形成一本书的规模。

把三件大事的“纪事本末”合成一本书出版,会不会给读者有不连贯的感觉?我的答案是:会,也不会。所谓会,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自成体系的书稿,事件与事件之间显得不那么衔接。所谓不会,是从早春文坛的整个态势,进而言之,是从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旧交错的形势而言的。

1976年10月,伴随着“四人帮”命运戏剧性的终结,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结束。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:是咸与维新,拨乱反正,还是萧规曹随?绝大多数在犹如漫漫冬夜的“文革”中度日的人们,选择的是前者;但是,历史的惯性使选择后者的也不乏其人。而且,这选择者还是具有法定地位的“接班人”。于是,“两个凡是”的治国方略出台了。那些在粉碎“四人帮”欢笑声中期待拨云散雾、看到万道霞光的人们,只能把陡然增大的希望变成了焦灼中的苦盼:历史的发展进入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的“两年徘徊”时期。

徘徊时期的中国,写下了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大较量的历史:“两个凡是”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,虽然使一些人“足将进而越趋,口将言而嗫嚅”,但是,中国毕竟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了,中国人民也不再是前十年间只靠一人思想、一人挥手,就愚昧得热血沸腾一味前进的人民了。用自己的脑袋思考,已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激发了终结“文化大革命”阴霾的勇气。伴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,真理压倒谬误的步伐在推进,到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历史终将萧规曹随者抛弃,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。“回春”的气象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了。一向被称为

“政治的晴雨表”的文学艺术界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，并以其独特的视角，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。

在与“两个凡是”的交锋过程中，拨乱反正的步履缓慢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，虽然“两个凡是”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是，历史的幽灵还一直在少数人中游荡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一直不断。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界，呈现出新旧交替、新旧交错的复杂的历史形势。

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，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而这种分歧，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，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的不同认识，也不免使作家有“乍暖还寒”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。

同时，在思想解放潮流暂时放缓文艺界强制性的垄断之后，异彩纷呈的文艺见解和作品又蜂拥而出。在有些人看来，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。但是，在有些人看来，则会对既往历史秩序形成某种威胁。于是，争论也不可避免。于是，又要“收紧”。然而，“收紧”可以，但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强调的“放”相左。于是，又接着“放”。“放”、“收”，“收”、“放”，这种又进又退、且进且退、且退且进的矛盾现象，成为早春文坛历史的一大鲜明特征。

这一鲜明特征，在本书所描述的一件大事中，都可以脉络清晰地得以体现。

上篇《新时期“两个口号”论争评价大争论》，从推翻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后又冒出个“文艺黑线”论，从是否把“国防文学”口号从“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”中排除出来，都充满着争论，这争论，实际上是新与旧的交锋中相互冲突；而所体现的方式，就是我在文中所用的一个标题：带着枷锁的舞蹈。伴随着枷锁的丁当声，读者可以充分体味这场思想交锋中的艰难与曲折。

《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》和《〈苦恋〉风波的前前后后》两篇，应该是互相衔接的。有了在起草报告中对“文革”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文学发展态势的不同认识，必然会有对某一部作品认识的分歧，而《苦恋》适逢其时的出现，使这种分歧便有了一个爆发

的焦点。而从对一个报告的争论，到对一部作品的否定与肯定的僵持，早春文坛“放”、“收”，“收”、“放”的特征，也就有了可解剖的标本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把这三件看似不相关联的大事放在一本书中，却是很连贯的。用一句话来说，都是解读早春文坛特征的标本。

本书写作过程中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：

书中引用了对一些文艺前辈的采访资料。他们在接受我的采访时，不但将所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说出来，而且对我的研究总是给予鼓励；

书中的文章分别在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、《新文学史料》和《温故》刊发，刘思源兄、张力副主编、冯克力兄都认真地进行编辑，有的并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。这些意见在书中都予以采纳；

我的朋友祝晓风博士（《中华读书报》编辑部主任），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，并给予敦促、鼓励；

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袁喜生先生、责任编辑张玉梅女士，在选题的策划和编辑工作中，付出了辛苦的劳动。

在此，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！

还需要提到的是，学术功底的培养，是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功夫而非一朝一夕。对于我来说，从搞很古的历史（我读研究生和毕业留校所搞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）转到很近的党史，再转到更近的当代文学史，大约有十年时间。这种角色的转换，纯粹是出于兴趣，从无有专业的素养，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编辑，诸事繁杂，在专家眼里我是一名没有队伍的“游击队员”而已。既然板凳仍没有捂热，谈什么些微功底自己都觉着脸红。因此，一般说来，对于专家而言，一本专著的后记中写上请读者批评指正云云是客气，而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实打实的请教了。若有方家愿意赐教，可E至：xqq0825@sina.com。

徐庆全

2005年9月20日·乐忧斋



(105)	.....	四
(115)	.....	五
(128)	.....	六
(139)	.....	七
(148)	.....	八
(158)	.....	九
(168)	.....	十
(178)	.....	十一
(188)	.....	十二

## 目 录

自序.....	( 1 )
---------	-------

## 上篇：新时期“两个口号”论争评价大争论

一 “两个口号”论争评价的几个阶段.....	( 3 )
二 周扬就“两个口号”争论给中央上书.....	( 14 )
三 带着枷锁的舞蹈.....	( 32 )
四 周扬倡导正确评价 30 年代文艺的历史.....	( 39 )
五 为“国防文学”正名.....	( 49 )
六 冯雪峰交代材料：一石激起千层浪.....	( 66 )
七 “西鲁”李何林为冯雪峰辩护.....	( 75 )
八 夏衍说“不能忘却的往事”，鲁研界再起波澜.....	( 93 )
九 楼适夷、吴奚如为冯雪峰、胡风争曲直.....	( 106 )
十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.....	( 126 )
十一 周扬与冯雪峰：“两只锦鸡”故事.....	( 134 )

## 中篇：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

一 胡耀邦改变大会筹备设想，决定周扬作主题报告.....	( 157 )
二 文艺界领导认识上的分歧，使文代会报告主题迟迟难以确定.....	( 176 )
三 林默涵主持起草的“报告草稿”.....	( 190 )

四	周扬的思考提纲·····	(204)
五	起草小组内的修改意见·····	(215)
六	各界人士提出的修改意见·····	(228)
七	辽宁和上海文联及黄钢的意见书·····	(269)
八	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报告的修改意见·····	(283)
九	根据与会代表的意见,报告再次修改·····	(289)
十	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表述方式的争论·····	(292)
十一	文艺“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”口号的提出与 争论·····	(310)

### 下篇:《苦恋》风波的前前后后

一	最初的争论·····	(322)
二	《解放军报》与《时代的报告》遥相呼应·····	(341)
三	震惊国内外的轩然大波·····	(356)
四	“文艺骨干座谈会”上两军对垒·····	(364)
五	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和《新观察》发出不同的声音·····	(373)
六	胡耀邦、邓小平的谈话·····	(386)
七	从“思想战线座谈会”到“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同志、 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”·····	(395)
八	《文艺报》批《苦恋》文章的写作过程·····	(414)
九	与这场风波相关的几个材料·····	(426)

上篇：新时期“两个口号”  
论争评价大争论



## 一 “两个口号”论争评价的几个阶段

“两个口号”，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“国防文学”和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。前一个口号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周扬提出来的，后一个口号是中央特派员冯雪峰与胡风商量后，征得鲁迅的同意提出来的。从“两个口号”论争开始的1936年到1978年，已经有42年了。四十多年来，对这次论争的评价，伴随着不同的政治背景，多有反复，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：

第一个阶段，从周扬等人到延安后直到1957年反右前。

“两个口号”争论发生后，提倡“国防文学”的周扬，来到了延安，而提倡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的冯雪峰，则因对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甚理解，没有应中央的要求回到延安。周扬到延安后，考虑到争论的另一方没有在场，只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正式地谈过这场争论，但并没有要求中央对此作出结论。

随后，徐懋庸到了延安。在“两个口号”论争的时期，徐懋庸担任左联党团书记。在1936年“两个口号”争论趋于尾声的时候，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，对鲁迅提出的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的口号表示了不满。病重的鲁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，写下了那篇著名的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的文章。因为成了鲁迅笔下的“‘恶劣’的青年”，徐懋庸感到十分的委屈。所以到延安后，徐懋庸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毛泽东汇报这场争论前前后后的情况，请毛泽东给个结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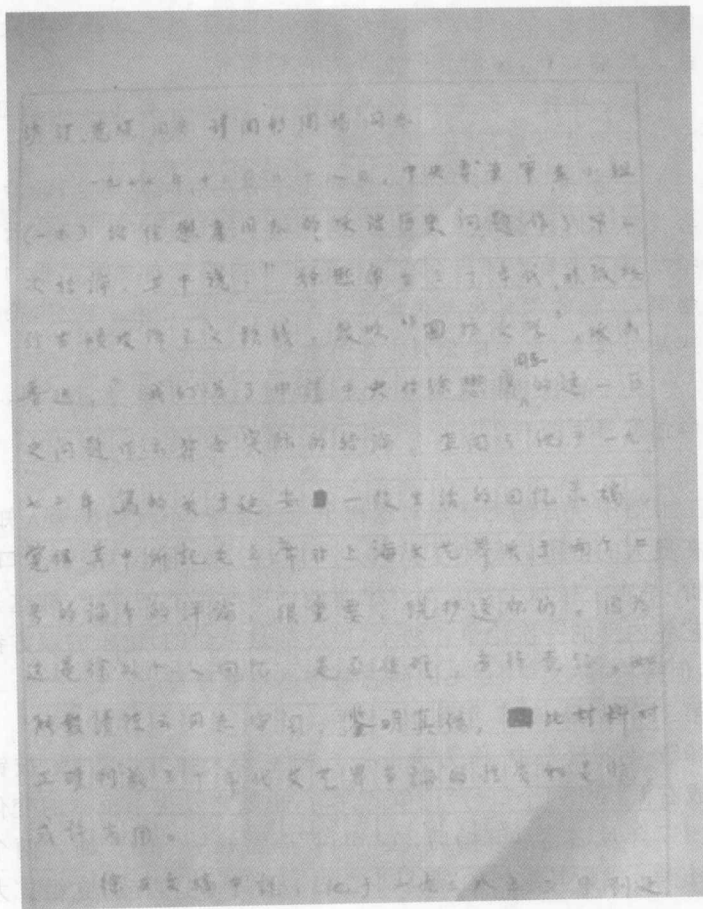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4月5日,在围绕“两个口号”的争论重新评价左翼运动之际,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徐懋庸的夫人王韦,对于当时中央专案组为已故的丈夫所做的结论不满意,给文学所的领导沙汀、陈荒煤写下一封信,并要求转给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周扬,详细披露了徐懋庸与毛泽谈话的内容。她在信中写道: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,中央专案审查小组(一办)给徐懋庸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作了第二次结论,其中说:“徐懋庸在三十年代,积极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,鼓吹‘国防文学’,攻击鲁迅。”我们为了申请中央对徐懋庸同志这一历史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,查阅了他于一九七二年写的关于延安一段生活的回忆录稿,觉得其中所记毛主席对上海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评论,很重要,现抄送你们。因为这是徐的个人回忆,是否准确,当待查证。如能报请陈云同志审阅,鉴明真伪,此材料对正确判断三十年代文艺界争论的性质和是非或许有用。”

徐在文稿中说,他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延安,五月中旬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,汇报上海文艺界情况。主席第二天回了一信,答应过几天相约谈话,第三天又派秘书和培元、华明两同志找徐谈话,一般地了解了一下“左联”的情况,然后在五月二十三日左右的一天下午,派华明将徐带到住处,听了徐的汇报。徐讲了约一个半小时,汇报了“左联”的情况,“左联”解散的经过,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,以及徐给鲁迅写信并遭到鲁迅公开驳斥的情况等。主席听了以后讲了如下意见:

- 一、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,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,我们已基本有所了解。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,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,具体一些。
- 二、我认为,首先应当肯定,这次争论的性质,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,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。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,鲁迅那边也不是的。
- 三、这个争论,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。从内战到
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是一个重大的转变。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，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、政策水平的不平衡，认识有分歧，就要发生争论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其实，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？我们在延安，也争论得激烈。不过你们是动笔的，一争争到报纸上去，就弄得通国皆知。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，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。



徐懋庸夫人王韦致沙汀等人信

革命年代，民族人海内共一

四、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有益的。争来争去，真理越争越明，大家认识一致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五、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，就是对鲁迅不尊重。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，你们应该尊重他。但是你们不尊重他，你的那封信，写得很不好。当然，如你所说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，鲁迅可能有误会，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。但是，你今天也说，那是因为当时处境不自由，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。

六、但错了不要紧，只要知道错了，以后努力学习改正，照正确的道路办事，前途是光明的。”

谈话中，毛主席还问起徐的工作分配和入党问题，最后要徐去找陈云同志谈谈。几天以后，徐找了陈云同志，又按陈云同志指示找了李富春同志。徐向他们汇报内容与向主席汇报的内容相同，他们的意见也与主席的上述指示一致。由此我想，徐的记述是否属实，也许陈云同志能够鉴别。

关于徐懋庸同志的政治结论问题，如你们能抽出时间，我想向你们当面报告。<sup>①</sup>

王伟信中所言的毛泽东对这次争论的看法，不仅周扬等人知道，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。所以，在这一阶段对“两个口号”的评价，基本上按照毛泽东与徐懋庸谈话中所定下的调子，即这是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次论争，“两个口号”都是革命的，论争的双方都有缺点，但持“国防文学”意见的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。

第二阶段，从1957年到1966年。

1957年的反右中，作为争论一方的主要人物的冯雪峰，被错误地划成右派，对“两个口号”论争的评价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，在“声讨”冯雪峰的“罪行”时，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，成为其重要的“罪状”之一。8月14日，作协党组扩大会

<sup>①</sup> 此信为私人藏品，未曾公布。



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，专门清算了冯雪峰在“两个口号”论争中的所谓错误，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，并通过对他的打击，来“改写文学史”。关于会议情况，冯雪峰是这样回忆的：

会议是从8月14日(第十七次)夏衍的发言开始，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“分裂活动”以及“打击”、“陷害”和“摧毁”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。也就是，以揭发我为幌子，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，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、为“国防文学”翻案的“高潮”了。我记得在8月14日、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，发言的人都非常多，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，会场空气很紧张，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。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，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《对丁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》(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)中都没有收入；但收有夏衍、陈荒煤、周立波、郭小川等人的发言，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。所有人的发言内容，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，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。

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，我当时当然不知道……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。8月14日会议之后，15日休会一天；16日会议到2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，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……当时周扬等人布置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，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，使我承认三六年我怎样“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”，同时“进行分裂活动”，等等，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，篡改历史，为“国防文学”翻案的目的……

在夏衍的发言中间，周扬也站起来，愤怒地质问我，说鲁迅《答徐懋庸》一文中“……轻易诬陷别人为‘内奸’，为‘反革命’，为‘托派’，以至为‘汉奸’者……老实说，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……”的一段话，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，这不是对他们的“政治陷害”又是什么？又说，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，这